

第七章 結論與討論

以下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發現，並進行總結。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歷史書寫的性別化」、「性別論述的狂歡化」等兩方面對李昂的《自傳の小説》，特別是其中情慾書寫的抵抗策略進行論述分析。具體的研究發現有以下幾點。這些研究發現也足以回答先前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

一、書寫形式的革命

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是：李昂在《自傳の小説》中建立何種書寫形式以進行抵抗？

就《自傳の小説》的書寫形式而言，本研究發現李昂試圖建構一種可被稱之為「小說的自傳」的新文類，並藉由「弱敘事性」的筆法，一方面洞悉並批判傳統歷史書寫的邏輯和侷限，另一方面藉此提出另一種歷史書寫的可能。在這裡，傳統歷史書寫在李昂的情慾書寫中，被「性別化」為有利於批判父權邏輯並建構「女人小寫歷史」的資源。

首先，在文類特性上，李昂藉由「虛實參半」的手法創造一個融合「自傳」、「小說」、「傳記」等文類，且在歷史／真實、虛構／想像之間擺盪的新文類。由於這個新文類在某種程度上還呼應或對照著作者的「真實人生」，因此本研究將其稱之為「小說的自傳」。

「小說的自傳」同時兼具「傳記性／歷史性」與「小說性」的文類特質。這使得《自傳の小説》展現出與傳統信奉客觀主義的歷史書寫非常不同的歷史書寫

樣貌，同時也挑戰了傳統歷史書寫典範中，把歷史等同於真實的認識論預設。在此，李昂揭示出的關於歷史與歷史書寫的立場是：**歷史不一定等同於真實的紀錄或再現，歷史書寫更像是以不完全符合客觀、中立的筆法並添加虛構／想像的色彩，對過去確實存在或未曾存在的事情加以「建構」的過程。**從這個立場出發，李昂開始進一步發展相關的歷史書寫工具，用來書寫「她的謝雪紅」。

接著，我們看到李昂試圖在文類上經營不同聲音／腔調混雜的「多聲並存」現象，搭配著「主詞的分裂與轉換」、「括弧的使用」等語法，創造一個多層次的文本空間。而在這個類似 Bakhtin 所說的「眾聲喧嘩」的氛圍中，李昂的歷史書寫穿插著不同主體位置的聲音／腔調，盡可能地干預文本意義的進展。另外，由於這些不同主體位置的聲音／腔調藉由括弧的區隔，呈現出迥異的意識形態立場，因此「多聲並存」的多層次文本空間更成為了多種符號意義交會、對話、折衝、對抗的開放性文本。這點除了挑戰了傳統歷史書寫為了顧及敘事的「完整性」，而傾向以封閉的、單音的文本空間說一個完整故事的做法，也讓我們發現：**籌劃一個具有高度「敘事性」的文本或許並不是《自傳の小說》的書寫目的，李昂在意的更是從特定的立場針對同一個事件與其中的性別議題提出不同版本的說法。**這即是本研究所說的「弱敘事性」。

除了對歷史書寫的認識論預設與「敘事性」提出挑戰，《自傳の小說》的「弱敘事性」還表現在對於傳統歷史「敘述」的反省和重構。在此我們看到李昂試圖藉由「重複」的筆法不斷書寫「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之間的不連續性，並建立自己的敘事時間。這種敘事時間不以傳統歷史書寫在「歷史敘述」上所遵循的線性、因果邏輯為準則，而呈現出定格、靜止的時間軸線。而《自傳の小說》更在這種定格、靜止的時間軸線上，有機會將焦點定格於特定的事件／故事，並且「重複」敘述其中的片段。

我們如果進一步觀察李昂「定格」於哪些事件／故事片段，當可清楚看到其中大量地出現對於女人身體感官和情慾的「名詞化」修辭。李昂更在此透露出把

「性」「極致化」與「粗俗化」的筆法。本研究認為，這樣的筆法除了呼應 Bakhtin 對於狂歡節身體論述的描寫（例如：卑賤化／世俗化、怪誕現實主義的風格），更挑戰了傳統歷史書寫在史料選擇上的偏見，並且補充了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中對性別議題著墨不多而留下的論述縫隙。據此，李昂以性、情慾為主軸的筆法，可說是一種歷史書寫形式的革命，也更是李昂意圖建構不同於過去歷史書寫的「女人小寫歷史」最主要的依據。同時，《自傳の小説》所開創的書寫形式的革命，更是後續進行性別意識形態鬥爭或提出性別政治寓言的基礎。這個發現更佐證了本研究先前在初步界定「抵抗」的意涵時，主張抵抗應是透過經營某種特定的語言「形式」以進行意義與意識形態的鬥爭之說法。

二、 性別論述的抵抗與抵抗策略

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是：李昂試圖藉由情慾書寫抵抗些什麼？又發展出什麼樣的抵抗策略？

本研究發現，除了針對歷史書寫進行文類與語法形式上的挑戰，李昂還藉由「敵對」的策略建構對話過程中的再意義化的諧擬表述，試圖藉由情慾書寫顛覆傳統的性別論述，並提出她的性別政治寓言。易言之，《自傳の小説》透過情慾書寫指涉出與父權意識形態的敵對關係，而對父權意識形態的諧擬又可區分為「性別批判意識」與「性別政治寓言」兩個相關的面向。此外，李昂這兩個面向上所援引的抵抗策略，也呼應了本研究在第二章提出的抵抗的三個意涵：符號形式分析的抵抗、歷史批判的抵抗、意識形態鬥爭的抵抗。

在「性別批判意識」上，李昂利用《自傳の小説》中，「主角謝雪紅」的主體化過程以及「主角謝雪紅『我』」與其他主體位置的聲音／腔調之間的互文干預現象，對父權邏輯所生產的「貞節論述」與「性別權力關係」進行諧擬與再意義化，同時藉此建構敵對／反對的狂歡化性別論述。

首先，李昂試圖藉由「主角謝雪紅」被他人話語所再現、滲透、規訓的「客體化」處境，對照「故事中的『我』」自小從三伯父那裡聽來的諸多反映父權意識形態的民間傳說或觀念（例如：女人在戰時必須時時有自殘以保全名節的準備），「召喚」父權意識形態並彰顯其實質內涵與運作過程。這裡我們看到的抵抗，可說是一種「社會系統的符號分析」，因為李昂試圖透過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意義系統進行符號形式的拆解（例如特定的性別實踐被固定於特性的性別角色上，形成社會系統中的性別理想或性別期待），以洞悉其意義生產邏輯，並作為後續提出反對論述的第一步。

接著，李昂從「主角謝雪紅」從被動到主動的情慾主體形構過程中，透過主角的自我意識展現對性別權力關係加以反省和批判。同時，藉由「主角謝雪紅『我』」與「敘事者」的聲音／腔調在行文中互相交錯和轉換；「敘事者」和「故事中的『我』」的疊合；再加上「主角謝雪紅『我』」藉由與「故事中的『我』」互相呼應，李昂嘲諷了父權邏輯本身的矛盾與可笑，並訴諸「一般女人／我們女人」也得以在從屬化的性別處境中，進一步轉化父權壓迫或對父權意識形態進行「再意義化」，以建構自身的主體性。在這裡，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李昂試圖批判性地檢視主流論述生產過程背後所反映出的歷史情境脈絡，並解構其中諸多自然化的性別論述，以確立自己的批判位置。此外，我們也在這些不同聲音／腔調的話語引述模式中，看到李昂的作者聲音／腔調藉由揣摩主角內在的感覺、認知和自我意識，逐步走入文本之中。

最後，透過上述所說的話語引述模式，李昂清楚劃分不同聲音／腔調的「界限」，並藉由「一般女人／我們女人」之口將父權意識形態指涉為「疆界」之外的「根本大寫他者」，以提出敵對／反對的「霸權化」論述。在此，「一般女人／我們女人」不只是李昂筆下所訴諸的言說對象，更是藉由指涉父權意識形態為根本大寫他者，而得以接合不同主體位置的聲音／腔調並建立「等同鍊」以提出自己的意義系統的「對話主體」。同時，李昂還藉由「故事中的『我們』」與「似真似假的謝雪紅『我』」之間既相同、又不同，有時後化為一

體、但在別的時候卻又維持一段距離的對話關係，重／改寫「一般女人／我們女人」的性別處境與生命故事。而這樣的重／改寫除了藉由建構一個極端縱情、主動求歡，並以「性」為生命原動力的情色／色情女人，更具將父權邏輯「陰性化」並拆解其中的「階序化」與原始暴力，或者進一步將對父權的批判提昇至「政治」、「殖民體制」、「國家」的層次，試圖彰顯政治權力關係的壓迫本質，以及女性在政治權力關係缺乏性別與政治主體性的困境之政治目的。

據此，本研究認為，李昂的情慾書寫可說是具有高度性別批判意識且意圖將父權邏輯加以「狂歡化」、諧擬的「論述行動」。而這個將父權邏輯「狂歡化」的「論述行動」是以一個新的真理政權取代舊的真理政權的「霸權化」策略而得以實踐，這正是一種在傳播／溝通或對話過程中所動員的意識形態鬥爭，又或者反映出一個從「對話化」到「狂歡化」的抵抗過程。同時，在此過程中，李昂／作者的性別政治寓言，亦即揭示出一種把性別抗爭「政治化」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手段，也得以在敵對／反對的狂歡化性別論述中呈現出來。

三、「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建構與政治方案實踐

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問題是：李昂所提供的抵抗策略對於「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建構帶來哪些啟發？

在閱讀 Bakhtin 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章節中，本研究曾經提出三個 Bakhtin 尚未充分理論化的宣稱：「意義的變動性」與「再意義化」之間似乎有個斷裂；諧擬的表述並不必然就是對官方文化的批判；身體低下部位的誇大描繪如何新生「非官方的民間真理」（Bakhtin, 1965/1984: 90），仍需要另給另說。本研究並且指出，Bakhtin 對於狂歡節抵抗意涵的揭露，較偏重於「內容層面」的探討；但如果要確實彰顯出狂歡節的顛覆性，則需要從「形式層面」上來重新理解民間節慶儀式的政治性。於是在第四章中，本研究融入 Bakhtin 的「眾聲喧嘩」、

Laclau 與 Mouffe 的「接合實踐」、Butler 的「論述行動」與「身體展演」等說法，為「抵抗如何可能？」提出具體的政治方案。

透過文本分析，本研究發現李昂的抵抗策略最重要的啟發，在於其情慾書寫中的「**策略性的本質主義**」，具體說明並實踐了從對話到狂歡／抵抗的理論轉折與政治方案。

首先，藉由刻意營造眾聲喧嘩與複調的文類和語法，本研究發現，李昂筆下的主角可說是 Bakhtin (1963/1984: 86) 所說的「人中之人」，活在與他人表述和話語意識對話的場景中。同時，這些主角還在與他人對話、產生互文性的過程中，以自己的聲音／腔調對他人的話語意識進行「變調」。這樣的「變調」一方面可說是 Bakhtin 所指出的對話過程中必然出現的話語「挪用」，另一方面更是將接合不同主體位置的聲音／腔調以建立「等同鍊」，並指涉出共同敵人的「接合實踐」。這裡，李昂抓住了眾聲喧嘩的對話模式中所提供的政治機會，對主流的意義系統與性別論述進行「再意義化」的抵抗與諧擬。

其次，進一步就性別論述的解構與建構而言，李昂筆下的情慾主體與對話主體所採取的抵抗策略是先對父權邏輯如何生產符號意義與性別論述的過程進行考察，再尋求對其加以嘲諷，以暴露其中的斷裂和縫隙的「**策略性的本質主義**」。這點也具體說明了 Butler 在「論述行動」中所提出的限制／從屬化與解放／主體化並存的說法，亦即抵抗並非在象徵秩序之外，而是在象徵秩序之中，藉由採取特定的「主體位置」並重複展演象徵秩序本身的矛盾，而得以實踐的諧擬。從這點回過頭來看 Bakhtin 所形容的狂歡節儀式節慶中的諧擬表述，我們可以說，諧擬表述中對官方宗教與政治儀式的模仿並非變相地承認官方的統治權威，而是一種暫時性的權宜之計，以利後續進一步裂解其中的普遍化與自然化宣稱的「**策略性的本質主義**」。

最後，依循著「接合實踐」與「論述行動」的理論／概念架構，李昂在《自傳の小説》中的情慾書寫與身體修辭藉由訴諸一個以「性」為生命原動力且主動求歡的女人與女人身體，對父權意識形態所生產的「貞節論述」與「性別權力關

係」加以「言過其實」地展演。由於此種「言過其實」的「身體展演」具有暴露父權意識形態的「壓迫」本質，並建構「霸權化」的反對／敵對論述的政治意圖與性別批判意識。因此我們可以說，身體低下部位的描繪並非妥協於父權邏輯的性類目或性別論述。透過身體的諧擬展演，有助於新生 Bakhtin 所說的得以諧擬官方教條主義的「非官方的民間真理」(1965/1984: 90)。就此點而言，Bakhtin 所主張的身體低下部位的誇大描繪與李昂把性視為生命原動力的情慾書寫，其真正的意涵並不在於身體論述的內容本身，而在於透過身體展演或情慾狂歡，我們得以洞悉主流意識形態的意義生產邏輯（例如：制定壓迫女性的性別權力關係或貞潔論述），並裂解其中的斷裂和縫隙以將其去自然化。所以，由此建構的反對／敵對論述，具有從「形式層面」動員語言／意義的解構和再建構的政治效應。

整體來看，本研究認為李昂在情慾書寫中所援引的抵抗策略，最主要是依循一種「策略性的本質主義」的政治方案。或者我們可以說，李昂透過情慾書寫所建構的反對／敵對論述，正是一種「策略性的本質主義」的抵抗實踐。「策略性的本質主義」主張在某種程度上接受本質主義的類目或宣稱，但其實是在接受它的同時，盡可能地挪用它、玩弄它、嘲諷它。本研究還發現，「策略性的本質主義」的政治方案除了幫助我們看見 Bakhtin 在狂歡節研究與眾聲喧嘩中暗示的政治機會，也呼應 Laclau 與 Mouffe、Butler 等人的後結構主義政治方案，並據此對 Bakhtin 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中的抵抗意涵與可能性提供了理論性的再詮釋和具體的案例說明。

第二節 結語

如同本研究一開始所言，本研究旨在從俄國學者 Mikhail Bakhtin(1895-1975) 狂歡節語言與身體論述的觀點探討「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並且以台灣當代女性主義小說家李昂於 1999 年出版的《自傳の小説》為主要的案例，重新思索

和說明語言／意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涵與可能性。在研究的過程中，本研究試圖透過理論／概念的探討和文本的分析，一再回應那個題目名稱：抵抗如何可能？

研究者雖然充分體認到這個研究還有許多值得再努力的地方，但是卻可以肯定地說，這個研究確實反映出研究者個人的思考歷程，研究者也在其中逐漸對於相關問題有更為深入的思考，而這些思考當然具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貢獻，也開啟了未來研究的方向。

個人以為，這是一本十分複雜的研究。因為無論就問題本身的界定、理論／概念的推演以及分析的呈現，都是相當高難度的嘗試。

就問題本身的界定而言，起初個人對於「抵抗」的意涵只有一些朦朦朧朧的感覺。一旦想要把那樣的感覺具體地陳述出來，就面臨無以為繼的窘境。後來接觸當代論著中牽涉到「抵抗」這個理論／概念的論述之後，雖然開始對「抵抗」的問題有了一些初步的構想。但是如何在當代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論述之上，提出個人對於「抵抗」以及「抵抗如何可能？」的見解，則成為了縈繞於心的問題。

個人發現，當代論述對於「抵抗如何可能？」的談論方式，最流行的說法乃是指出一種「結構」（structure）與「施為／行動」（agency）之間的辯證關係，主張主體的行為受到結構制約所限，但主體也能夠在結構制約之下發揮能動性。這個說法十分吸引人，但對個人而言，卻是太過簡化了。因為個人關心的，不只是知道「結構」與「施為／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而更是充分利用這個辯證關係，動員一種由下而上的民主化運動和「抵抗」。

扣連所學和興趣，個人最後選擇從當代論述分析（特別是批判取向的論述分析）著手，進行這個研究。個人並且發現，透過 Bakhtin 在狂歡節研究所揭示出的抵抗想像，有助於論述分析超越原先比較重視分析主流意識形態如何由上而下地設定符號規則，但忽略反對論述建構的研究視野，更全面性地探討「結構」與「施為／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以及此一辯證關係中的政治機會。同時，這個分

析視野也得以正視 Bakhtin 理論／概念模型的缺失（例如：並未充分說明從「對話化」到「狂歡化」的理論轉折），並進行理論性的再建構。

就理論／概念的推演而言，個人以 Bakhtin 的論點做為靶子，也是很大膽的做法。因為 Bakhtin 的學說在西方早已是許多領域和許多學者研究、鑽研的題材，目前也已持續累積了非常豐碩的論著。可是，個人在文獻檢索和閱讀 Bakhtin 著作的過程所發現的理論／概念推演的問題，卻尚未有人處理過。個人起初以為會否是自己在理論／概念閱讀的過程中，誤解了 Bakhtin；或是 Bakhtin 與 Bakhtin 研究者其實已經設想到個人所提出的問題，只是個人遺漏了某些重要的文獻。

直到後來，個人逐漸領悟，理論／概念的閱讀和批判本來就是一個抵抗與說服的過程，因為我們必須先對理論／概念的演繹和它所反映出的思維邏輯有所掌握，並洞悉其中可能的問題，接著再嘗試提出合理的理論再詮釋。想通了這點，個人開始盡情地揮灑思考與想像，也從中對 Bakhtin 的論點提出了一些深刻的反思。甚至最後還意外地發現，文中把後結構主義的論點和 Bakhtin 的說法進行接合，其實在某個面向上，打造了兩者互相補足的理論對話平台。

因為雖然自 90 年代以來，文化研究的領域中已有學者開始擷取語言學／符號學的理论資源，從「語言／意義」的面向重新問題意識化論述如何被象徵秩序的權力關係所形塑，而論述又如何回過頭來將社會實踐與體制再意義化。論者並據此說明主體的身分與認同如何在權力關係中形構以及其中的從屬化／主體化過程（見林淑芬，2003, 2005, 2006；Laclau, 1996）。但是，至少就本研究所倚重的 Butler 的理論／概念而言，在現階段尚未確實討論語言／意義、符號的認識論以及如何將其回饋於「身分與認同政治」的論述分析。她對於語言學／符號學的援引也流於工具性。就這點而言，Bakhtin 對語言／意義的抵抗意涵的討論使得後結構主義在思考「再意義化」或諧擬何以具有抵抗意識時，有了一個較為細緻和微觀的切入點。

反過來說，Laclau 與 Mouffe、Butler 在「抵抗如何可能？」的政治方案規劃上所提供的「形式層面」的參考，也有助於個人重新思索並肯定 Bakhtin 原初的

理論／概念模型中，確實隱含著抵抗的可能性。另外，這個思索也重新正視了結構主義敘事學或俄國形式主義主張敘事的「論述」（形式）應優先於「故事」（內容），確實是一個有效的文本分析策略。

就分析的呈現而言，有別於一般論述分析或意識形態批評比較強調的是文本內容的拆解，從形式上來談抵抗，或以語言形式分析為基礎的文本意識形態批評，在研究報告的撰寫上，確實更為困難。再加上本研究所處理的文本具有複調小說的特性，因此辨識文本中不同聲音／腔調的主體位置以及她（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本身就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但這也只是文本分析的第一步。因為更重要的是，在清楚呈現這些語言形式與特性的基礎上，詮釋李昂情慾書寫在內容上的抵抗與抵抗策略。

在這樣高難度的考驗下，個人以為，文本分析的深度應該比廣度來得更為重要。也就是說，以一本代表性的著作為分析對象，比廣泛地納入所有其他可能適合的案例，更為符合研究的需求。因此，諸如台灣文學領域中其他具有眾聲喧嘩、狂歡節意象、複調小說特性的作品（例如：王禎和（1994）的《玫瑰玫瑰我愛你》、平路（1995）的《行道天涯》、黃春明（1985）的〈莎喲娜啦•再見〉、王文興（1999）的《背海的人（上）（下）》），只能留待以後的書寫再來進行。

另外一點與分析呈現相關的問題也值得提出。雖然本研究自我定位為理論性的論文，而文本分析的結果旨在對「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概念架構進行例說，但是李昂的《自傳的小說》是否真能彰顯 Bakhtin 所描述的眾聲喧嘩或複調？複調小說得作者身影究竟要以何種方式走入文本，才能避免「單音獨鳴」？什麼樣的作者與主角關係能夠一方面肯定他人話語意識的主體性，另一方面又能折射出作者立場？這些問題或許仍值得深思和評估。

最後，這本十分複雜的研究到底回應了什麼樣的生活經驗？又提出了什麼理論性的和日常生活的省思呢？對個人而言，在一個根本的面向上，「抵抗如何可能？」的問題，探討的正是關於人的「自由」如何可能這個人文社會科學最基本的議題之一。因為在生活的社會情境中，我們無時無刻都受限於某些期待、規則、

規範，但也總是試圖探索在這些期待、規則、規範之中，能否呼吸到一些自由的空氣。

針對這個議題的討論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已經累積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就語言／意義與民主化的理論建構而言，卻仍有相當大的空間或空缺有待被填補。對此，個人藉由反思現階段論述分析與 Bakhtin 論點的不足，指出在理論性的層次上，「抵抗如何可能？」可說是在眾聲喧嘩或「弱敘事性」的文本空間中，藉由「接合實踐」動員由下而上的「論述行動」，並藉由「策略性的本質主義」此一政治方案建構霸權化論述的意識形態鬥爭過程；而「身體論述」所誇大展演出的敵對關係，則是最具渲染力也最為具體的例說。此外，就日常生活的實踐層次而言，個人認為，抵抗的可能性可說是種不間斷的政治發明過程。這個政治發明的過程基本上是種「困勉而行」。但更重要的是，在「困勉而行」中，我們也可以有一些些的「率性而為」。

那麼，這個困勉而行中的率性而為，如何被放在更寬廣的語言哲學系譜和知識中來理論化？如何建立可供後續研究參考的分析架構？如何用來分析其他的文本？這篇論文在嘗試把「抵抗」這個虛無飄渺的詞彙帶入人間的同時，也看到將來的研究計畫在此開始萌芽。對此，個人有以下的粗略構想：

關於抵抗的語言哲學系譜和相關的知識論述，個人對「抵抗」的提問，基本上並不是一個 Saussure 所代表的結構主義會提出的問題，而比較偏向後結構主義的知識觀。然而，個人卻在這一個可被歸類為後結構主義式的提問中，彰顯並放大了結構主義的獨到見解和貢獻，亦即從「形式層面」進行「抵抗如何可能？」的理論建構和文本分析。同時，在第二章針對抵抗的意涵進行文獻探討時，個人也發現當我們試圖追問何謂抵抗時，其實背後反映出的正是從結構主義過渡到後結構主義的論述理論視野；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這標示出當代語言哲學典範的轉移或典範的精煉過程。而這個典範的轉移或精煉的過程，以及其中牽涉到的對語言／意義的立場，如何回饋或啟發我們對抵抗、「抵抗如何可能？」的想像，這是個人後續會再持續進行探討的其中一個課題。

另外，即便是在後結構主義的陣營中，對於語言／意義在民主化／抵抗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也有相當異質的說法。例如受到 Lacan 精神分析影響的語言哲學派別，主張象徵秩序只是語言／意義產生的一個面向，象徵秩序也不會是形構主體的元素，因此語言／意義的社會性絕不能夠被等同於象徵秩序。這個主張明顯與個人並未嚴格區分符號、社會歷史、權力關係、象徵秩序等術語的做法互相衝突。雖然在現階段，這個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這篇研究所能處理的範疇，但卻值得日後仔細深究。

關於「抵抗如何可能？」的分析架構，個人在第一章藉由檢討過去李昂研究的問題所提出「書寫形式的意識形態分析」，亦即「論述」（形式）優於「故事」（內容）的研究策略，嚴格來說並不是原創性的主張。因為在結構主義敘事學或俄國形式主義學者的論著中，早已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並實際進行了一些文本意義研究。然而，如果我們對這些研究成果稍稍加以觀察，不難發現即使是宣稱以敘事學方法進行文本分析的研究中，也經常並未落實以形式為本的方法論立場。而這個狀況在台灣自 90 年代以降大量出現的傳播的文本意義研究裡，恐怕更為嚴重。個人認為，或許將來值得針對過去的文本意義研究進行方法論上的後設研究，並進一步與相關的理論／概念或觀點（例如：Bakhtin 對於唯心論的挑戰以及對於俄國形式主義流於過度「形式化」的批評）進行對話，以提出文本意義研究在實際進行文本分析時，能夠同時關照形式與內容層面又可供具體參考或操作的分析架構。

關於如何把這篇論文針對「抵抗如何可能？」此一問題的理論化與研究策略應用在分析不同媒介特性的文本，也是將來值得推敲的方向。特別是在新聞文本的論述分析上，目前已有研究指出，在衝突性事件的媒體報導裡，標榜「客觀性」的新聞論述為了顧及平衡報導，會引述不同的論點並讓這些聲音／腔調在其中並存。但是在眾聲喧嘩的表象背後，卻似乎仍存在著一雙看不見的手，設定了「獨白的論說秩序」，以替權力集團代言並維持其在社會與政治上的優勢地位（見戴育賢，2002）。這個說法十分值得重視。因為它等於指出了過去被認為表述應該

儘量明白且直接、敘述必須淺顯易懂的新聞寫作也可能出現文學作品裡常見的眾聲喧嘩和複調；同時，它也進一步說明此種新聞文本中的多聲並存現象與 Bakhtin 所指陳的語言／意義的民主化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因為從那些新聞報導的內容來看，仍清晰可見一個權威的聲音／腔調主導並操控著訊息的設計和呈現。簡單來說，這個說法暗示著新聞的媒介特性與複調小說等文學作品的媒介特性有所不同，兩者也因此產生了不同的眾聲喧嘩樣貌；而媒介特性上的差異更對文本空間是否多元開放或單音獨鳴，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從這點加以延伸，不同的媒介特性具有何種不同的抵抗意涵？不同的媒介特性在實踐個人所關心的語言／意義的抵抗上又呈現出什麼樣的不同圖像？個人以為，這些問題在一時之間，恐怕很難有個簡單的答案。

